



1905年，瞿秋白到常州觅渡桥冠英小学堂求学。图为瞿秋白在冠英小学上过课的教室。

百家谭

梁衡

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契合，那么一个人与一座城呢？

如果让我在故乡之外再举出一座交往最多的城市，那就是常州了。常州人待客时常说一句话：“常州，常州，常回来走走。”而我自第一次去常州做客之后，常来常住不觉已30年。

像许多有缘人的故事一样，第一次结缘总是偶然。那还是1990年5月，当时我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，因公去处理一张报纸的创办事宜。事毕，我问常州有什么名胜可看。主人，即那张报纸的筹办人王荣泰先生说：“有。小小常州城出了三位共产党的早期领袖：瞿秋白、张太雷、恽代英，都有故居和陈列馆在。”我们就信步来到瞿秋白纪念馆。瞿是继独秀之后党的第二位最高领导人。

纪念馆是一座老祠堂，也即瞿秋白的故居。原来，当年秋白家道中落，已穷得居无片瓦，就寄住在瞿家祠堂里。我参观过后深为秋白的家世之苦和人生坎坷所动，心情正处在压抑、悲恸之中。时已黄昏，老屋旧院，暮云四合，周围显得有几分凄清。突然院子里出现几个孩子在打打闹闹地扫地干活，脖子上的红领巾飘动着，如闪闪的火苗，为这所老宅增加了几分生气。

我问：“哪里来的小学生？”答：“旁边有一所小学，学生常来纪念馆义务劳动。”“什么小学？”“觅渡桥小学。”“觅渡”二字让我心头一惊！一般地名多是张家巷、李家桥什么的，怎么会有这样文雅的名字？令人想起李清照的“寻寻觅觅”，或屈原的“上下求索”，更联想到秋白临刑前的那一篇《多余的话》，他一生都在寻觅生命的渡口。我便问这个地名起于何年，答曰：“至少清代嘉庆年间，瞿家祠堂前就有一条河，河上有一座，名觅渡桥。到上世纪‘备战备荒’时，河已干涸而改建成防空洞，洞上修路，就是现在的这条市中心马路。”啊，200年前就有“觅渡”二字，难道真有什么谶纬之说，真的就一戳成真了吗？而且竟又长留此名，以为历史之索引。

就这一点缘起，打那之后我几乎每年去一次常州。“我在这间旧祠堂里，一年年地来去，一次次地徘徊。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，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。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，到上海办学，去会鲁迅；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，去会孙中山；到苏俄去当记者，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；到汉口去主持八七会议，发起武装斗争；到江西苏区去，主持教育工作。”六年后我终于写成《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》（以下简称《觅渡》），很快被广为转载，并入选中学课本。我亦被聘为瞿秋白纪念馆名誉馆长。2005年6月在秋白就义70周年时，这篇文章又被刻石勒碑立于纪念馆院中。翠竹绕石，桂花飘香（秋白出生的老屋名八桂堂），游人肃然。我陪同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先生来参加活动。2016年全国党史、新闻出版及文学界学者又专门在常州举办《觅渡》一文发表20年研讨会，怀念秋白，研讨觅渡精神。正如文章最后一句话所说：“哲人者，宁舍其事而成其心。”“觅渡”成了概括秋白悲剧人生的最好的文学意象，又是一种诚实人格与探索精神的象征。常州街头甚至出现了以觅渡为名的商店。

王荣泰先生见此灵机一动，就想何不注册一个公司专门推广觅渡文化。谁知，早有人先他一步。网上一查，全国竟有了100多个以“觅渡”为名的公司、中心等，“觅渡”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真可谓“觅渡，觅渡，惊起一片鸥鹭”。于是他决定在常州，这个“觅渡”的发祥地成立一座觅渡书院，弘扬觅渡精神。在筹备过程中，远在湖南的一位宣传干部一定要求参加，原来她的网名就叫觅渡。叫甘肃的一位才20岁的在校大学生网名也叫觅渡，可见文

## 常州城里觅渡缘

传风走，秋白精神不知已静悄悄地打动了多少人的心。广西某地产一种玉陶，竟送来一个大陶瓶，上刻《觅渡》全文。而远在新疆的一位朋友听说要建觅渡书院，竟从数千里外寄来一段沙漠里的老胡杨木，借以歌颂秋白之坚韧，上面题刻：“大漠胡杨，春风玉关。觅渡人生，来到江南。”“觅渡书院”成立之时八方来客，好不热闹。觅渡成了常州城的文化符号，又辐射到了全国。

因为常来常州，就想到了秋白之外，这里还有哪些文化名人。稍一打听，竟多得数不过来。历史上的常州包括现在的无锡、宜兴，直达太湖之滨。大运河穿城而过，商业繁荣，文人云集。龚自珍的诗《常州高才篇》说：“天下名士有部落，东南无与常匹俦。”文人名士已多得不胜数，曾产生过1900多位进士、9个状元。名声最大的当然是苏东坡了，他被贬海南赦归之后，便在常州买了一块养老之地，可惜命运不济，很快去世，要不然定会是这个“部落”的大当家。其余还有那个部有名句“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的宋末词人蒋捷。近现代人有盛宣怀、李公朴、赵元任、刘海粟、周璇等，都是谁人不知、哪个不晓的人物。新中国成立后常州又出了57个院士。就说这个觅渡桥小学吧（简称“觅小”）也名声赫赫，它是秋白的母校且不用说，竟还又出了6个院士。现在已是“觅渡教育集团”，有6000名学生，规模宛如一所大学，泱泱一江南名校。行文至此顺便讲一个笑话，我因与“觅小”的孩子当年缘结一面，才有了《觅渡》一文的流传，学校就赏我一个名誉校长，并正式颁发了聘书上网公布。一天忽然收到一封家长的来信，说孩子到了上学年龄，“觅小”门槛甚高，一“额”难求，求我这个“校长”开个后门。他哪里知道我只是挂个空名，但这倒说明“觅小”的影响之大。

因为《觅渡》一文的传播，觅渡桥这个老地名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。但是时势所移，原桥早已不见。常州本是大运河上的一座水城，历史上石桥无数。若能再找回一座承载有浓浓的地方文化的老桥，重续200年前的历史，也是一段佳话。这个念头一出，就成了两个当事人，觅渡书院院长王荣泰与“觅小”校长吴毅先生的心病。他们前后3年翻查资料，探访旧人，总算弄清了原桥的位置、式样，又请人设计施工。已经消失了200年的觅渡桥穿越历史风雨，将重现于现代都市，静静地卧于秋白纪念馆与“觅小”的门前，向人们叙说如烟的往事。缘分这个东西真是说不清，当年若是不碰见那几个红领巾，怎么会知道觅渡桥；若没有觅渡桥，怎么会有《觅渡》文；若没有《觅渡》文，我怎么会与常州有了这许多扯不断的情？现在要重修旧桥，我当然脱不了干系，他们就请我写了一篇《觅渡半桥记》刻于桥头，以记缘起。记曰：

岁月流逝，山河易位。清嘉庆年间常州城内有一条城子河，河上有座觅渡桥。年荒日久，河桥早废，无人人知。幸好桥边有一所觅渡桥小学，为老常州保存了一个旧地名。小学曾是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的母校，桥下的瞿家祠堂亦是秋白的故居。他当年就是踏过这座桥走上革命道路的。觅渡桥见证了中国和常州的一段近现代史。

为留住历史记忆，常州《中国剪报》社与觅渡桥小学发起重修觅渡桥。但原桥早已被穿城大街切去一半，车水马龙，旧景难再。于是别生创意，仍在北岸原址建桥，腾空向南戛然而止，是为半桥。时空穿越二百年，瞬间定格在一时。时人轻抚桥栏，念天地之悠悠，感时代之变迁。行百里者半九十，后来者当更起宏图，长虹万里架到天外去！

算来，自我第一次来常州已经整整过去了31年，而《半桥记》与《觅渡》两文也已相隔25年。鲁迅曾手书一联赠瞿秋白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。常州于我虽是一座城，却也配得上同怀知己了。人生能有几个二十、五十、几个三十？

## 当我们谈论书院时我们在谈论什么？

专访

本报记者许晓青

从《书楼探踪》《书院探踪》到202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《书院觅踪》，我国当代传奇藏书家韦力佳作不断。

在这位藏书家看来，书院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载体。中国的书院历史十分悠久，成为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，在中国教育史上有较大影响力。在教育之外，书院还承载着书籍流传、文明传承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。

历时7年多，韦力寻访中国古代著名书院的遗迹、遗踪，亲临实地勘察考察，考订史实和掌故，以游记形式聚焦北京金台书院、河北莲池书院、山西石芸轩书院、长沙岳麓书院、浙江万松书院、浙江紫阳书院、陕西正谊书院等57座古代著名书院的遗址。

### “打开”书院的正确方式

“凡与书沾边之事，都令我会像蛇吞象般列入寻访计划之中，足吾所好，忘吾力穷”。韦力如是说。

从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《书肆寻踪：古旧书市场之旅》《书坊寻踪：私家古旧书店之旅》《书店寻踪：国营古旧书店之旅》，到耗时4年遍访典籍中记载的163座古代个人藏书楼的《书楼觅踪》《书楼探踪》，再到对几十位古代藏书家之墓及古代遗址寻访，进而写成《书魂寻踪》，新近这部用7年多时间寻访中国古代的著名书院遗迹而写成的《书院寻踪》，是韦力先生锲而不舍、辛勤耕耘的一种“读书”方式。

简言之，有了书院这座“桥梁”，藏书家从“藏书”出发，上下求索，又回归“藏书”。

《书院寻踪》是韦力2020年首部与读者见面的书。韦力谈到，《书院寻踪》是一部将游记、掌故、史料结合在一起的书，不会因为纯粹游记性的抒情，而觉得太寡淡，也不会因为史料性太浓而觉得只有参考价值，进而完整地保存阅读的愉悦感。

有媒体点评，韦力的一番作为，是想通过系统、专门地介绍各地书院的藏书，让读者理解藏书才是书院的“正根儿”。

本报记者许晓青、董雪

草地：您是当代知名藏书家，藏书、爱书本身，与探访古代书院遗址遗迹有哪些内在关联？

韦力：今天的古代书院遗址已与当年的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不可能在遗址上寻觅古籍。探访书院遗迹，更多是通过这个活动讲述曾经的一段重要历史，我并没有抱希望在那里得到更多的藏书。

但任何事都有内在关联性，正是因为我喜欢收藏古籍，使得我对传统文化有了别样的亲切感，你可以认为这就叫“爱屋及乌”。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方方面面，我都会感兴趣。尽管传统中有精华有糟粕，但择善而取之，还是有用之不竭的优点在。通过收藏典籍，我注意到古代书院的刻书与藏书；通过书院史的梳理，我了解到中国传统文脉延绵不绝，古代书院起到了重大作用。近些年来，不少学者专家注意到这一点，比如岳麓书院的邓洪波先生，他搜集大量书院史料，出版多本专著，系统梳理了书院文化的历史。

出于各种原因，关于古代书院的状况，当今学界主要停留在史料梳理及研究方面，少有人进行系统的实地考察。书院既然在传统文化史上有这么重要的地位，应当通过田野调查，系统考察各地书院的留存状况，以便了解哪个地区集中了多少家书院、每家书院有什么特色，这些书院对于当地文化有怎样的影响。我认为，只有通过实地探访，才能将这些观念有机结合，形成更加立体的认识。

草地：您以寻访书院来丰富您对藏书的整体性研究。在您看来，梳理书院历史何“反哺”藏书研究？

韦力：其实古代书院跟藏书有密切关系，比如唐代开元年间创办的丽正书院，其原本的功能只是藏书。只是因为古代书籍珍贵难得，大多数人买不起书，而官府藏书没有资金方面的压力，所以能够聚集丰富的典籍。文人都想方设法到书院去看书，也必然会探讨书中内容，因此书院就渐渐成了学问研讨之地。这一过程中又会吸

韦力透露，《书院寻踪》是7年寻访的部分成果，记录了57家书院，而他总计踏足的书院及其遗址多达100余处。

“寻访”要提前做好功课。“有的书院，光资料我就查了好几年。所有的寻访基本都是有计划。有备而来，而非一时兴起。”他说。

近现代史上，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传统书院体系也不得不“辞旧迎新”。书院被改造成各级学校，书院的性质也随之改变。算起来，书院在我国也已有100多年的消亡史了。但是，韦力认为，书院在历史上的作用很大，因为它曾经存在了上千年。去寻访这些遗迹，就是为了去记录一段重要的历史，它是中国藏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更何况书院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。

### 藏书人的初心“照见”书院藏书

“如今，许多书院都没有痕迹了，寻访就难在这儿，你能知道那些东西很有价值，但是你找不到它。那么为什么还要寻访书院？”

韦力在2020上海书展上自问自答。他说，因为书院和藏书史有关。他认为，在中国古代，教学并不是书院的唯一功能。我们现在一谈到书院，本能地把它想成一个教学的地方。这个概念源于宋代，当年朱熹到书院讲学，所以渐渐地把书院变成了一个以讲学为主的地方。

但韦力提出，书院最初的功能是藏书，放入藏书史去研究，才豁然开朗。比如，唐代的官办书院，建好之后，中央或者地方政府要在那里藏书。随着藏书的丰富，越来越多的学人会集中到书院读书。在读书的过程中，他们各抒己见，对读书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研讨，书院也因此逐渐成为研学的地方。这就是后来那么多文人集中在书院的原因。教学功能后来居上，藏书功能被掩盖起来。

他还提出，虽然中国古代有官府藏书，但官府藏书主要是服务官僚体系。私家藏书楼则基本服务于家族内部。但书院藏书不同，这种藏书方式具备了公共图书馆的雏形，因为它是对公众开放的。如果追溯中国现代图书馆的起源，可追溯到古代书院，而不是藏书楼，这是大家很少提及的。沉淀下去研究，还会发现书院藏书以儒学经典为主。中国历史典籍流传至今，绝大多数是儒家经典，所以说

## 从书斋珍藏到“田野”考察——对话藏书家韦力

引更多人旁听，于是书院又逐渐变为讲学之地。此后讲学成为书院的主体，弱化了原本藏书的功能。

我对书院的梳理，目的之一是想让人们更为清晰地了解书院的历史，比如书院在藏书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。书院在开展讲学的过程中，也刊刻了一些典籍。书院刻书的特性是什么？在内容方面有什么偏重？他们的底本来源是怎样的？书院刻书比书坊刻书的质量有怎样的提高？诸如此类的问题，都值得深入探讨。我在探讨的过程中，渐渐认识到书院刻书的特性和重要性。近些年来，我通过寻访，梳理了书院史，进而认识到书院刻书的重要性，于是书院藏书与刻书成为我藏书中一个重要专题。这应当是寻访书院给我最大的“反哺”吧。

草地：改革开放后，我国的藏书市场也几起几落，这其中有哪些是内在规律？哪些又是不可测因素造成的？

韦力：确如您所言，改革开放对中国现代藏书史来说，是一个重要的节点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，人们逐渐认识到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性，很多有识之士捐出自己的藏书给公共图书馆。这种化私为公的过程，成为当时公共图书馆古籍的主要来源。1949年之后，全国各地大量的藏书，进一步归入公共图书馆。随着私人藏书式微，社会上很少有人再收藏古籍，那时的国有古籍书店仍然有收藏和保护典籍的任务。但古籍书店仍然是经营者，他们收购到的典籍当时主要供应给公共图书馆。然而很多公共图书馆又因为经费问题，只会购买少量古籍。大型公共图书馆重在增加品种，一般的典籍如有库存，若版本没有区别，他们便不会再买。古籍书店因此积累了大量库存。

正是改革开放，让古籍书店堆积如山的“库存”有了“新出路”。自那时起，古籍书市成了爱书人重要的“节日”，书市使古籍散入千万家，同时也传播了藏书文化。之后古籍进入艺术品拍卖市场，更多人意识到书籍既有史料

书院藏书才是公共图书馆藏书品种丰富的源头。

这就是书院藏书与藏书楼藏书不同的地方。和藏书楼不同，即使书院是私人所办，它也带有半公开性质。有的书院虽然名义上招收同姓子弟，但是基本上不会拒绝外姓学子，所以说古代书院更具有公共性质。因此藏书史上必须单列出一个门类来，不能把书院混在藏书楼里面，因为它们性质不同。

韦力还提出了大胆的体系建构，他认为，中国古代的藏书一般分为官府藏书、宗教藏书、私人藏书和书院藏书，这四个部分加起来构成中国藏书史的完整体系。而我们在谈藏书史的时候，重点叙述的就是官府藏书、宗教藏书和私人藏书，很容易忽略书院藏书。

### 传承书院藏书的精神之根

近年来，各地又开始重视对古代书院的研究，有的地方恢复了一些书院，但恢复数量有限。有的书院是新建起来了，如宋代四大书院中的应天府书院，是彻底新建。而岳麓书院、嵩阳书院等都在原址上，保留下了古建筑。

当有媒体问及，当代书院和古代的书院有何不同？古代书院是不是已经彻底消亡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？

“古代书院没有彻底消亡。”韦力这样回答，比如岳麓书院，到今天仍然是湖南大学的一部分，并且学者仍然在这个地方讲学，进行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，搞得有声有势。“我到岳麓书院去参观的时候，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这种气势。所以岳麓书院一直延续到今天，仍然是教学重地。”

韦力感慨，《书院寻踪》的问世，是为了讲书院藏书的历史，并非只谈书院本身，而本世纪以来各地新建的书院，没有看到有什么藏书，这才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一种遗憾。

谈及个人寻访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一座书院，韦力特别提及江西华林书院。“我没想到它建在深山里，四周都是荒野，路上也看不到村庄。我想，古时候应该比现在人口更少；当然今天的山里也有书院，但多是休闲雅玩的地方，显然不是读书的地方。”

“古代的书院及其藏书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深藏于大山里的书院，谁会来呢？”韦力依然充满好奇，对中国古代与书籍相关的一切，都在他的寻访之列，而依然还在寻访路上。

性，又有文物性，因此很多人走入古籍拍卖行列。但是古籍拍卖跟经济有密切关联，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，无论古籍拍场还是古旧书市场，书价都有一定的下滑。古籍虽然是文物，但有其特性，不同于其他文物古玩。如果站在宏观角度看，古籍市场始终是向上的趋势。出现这种结果，一是读书人对古籍的热爱，二是前几十年古籍太便宜了。

草地：据您观察，目前的藏书市场处于什么状态？在这个时机寻访书院，是否能进一步促进藏书市场的复苏？

韦力：目前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因为赶上了新冠肺炎疫情，古籍拍卖、古旧书会都无法举行。近几十年来，这两个市场都是定期举办，比如拍卖市场，基本固定春秋两季各举办一场大型拍卖，中间穿插几个小型拍卖。因为疫情的影响，2020年春拍几乎全部停止了，有的移到了秋季举行，而秋拍则只能推到2021年。

2020年举办的几场古籍拍卖，虽然从整体上不如以前景气，但是有些稀见本的价格却高于以往。可见有些爱书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不能放弃对传统典籍的钟爱。

草地：在古籍保护和“活化”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分享？

韦力：您所谈到的“活化”，我想更多的是指古籍整理吧。这分为两部分，一种是对珍本古籍的影印出版。这对研究者最为有利，因为古籍本身是文物，每翻阅一次都对它有损伤。但是用来读的，如果为了保护而不让人翻阅，那么古书就成了“死书”。如何解决典藏和使用之间的矛盾？影印出版是最佳手段。有些古籍留传稀少，有的也已成了孤本，古籍影印能够将一部书化身千百，使得孤本不孤，且能让更多的人来利用文献，这是很好的一种保护方式。

“活化”的另一种方式是点校整理出版。这种方式费时费力，但更利于普及。因为古书没有标点，一般读者有阅读障碍，经过点校整理之后，能够使古籍更加普及，其售价也会比影印出版便宜很多，这同样起到了普及的作用。